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主体性建构

——兼论刘大先《文学的共和》

邱 婧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诸多研究者先后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观进行重新构建与反思，新世纪以来获得了推进与发展，刘大先的《文学的共和》一书以多元视角切入对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建构的讨论，从“史”“论”“文本”“影像”“田野”等部分各自进行聚焦论述，重新审视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史，在多元化语境下反思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并基于对若干文学文本、电影和田野调查样本的考察，提出了“文学共和”的本土批评形态，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史建设提供了较有意义的参照。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批评 学科史 文学共和

1995年，关纪新和朝戈金曾经在《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中，厘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趋势和文化生态：“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生存氛围；互动状态中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①在这一语境下，他们通篇关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论述都指向新型的、跨文化研究视野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次年，汤晓青撰文指出新型民族文学批评观建构的可能性与必然趋势，认为《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已经不再拘泥于单纯的作品分析和欣赏，而是从多元化的角度构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批评^②。21世纪初，罗庆春和姚新勇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构建各抒己见：前者认为，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已经初见雏形，开始从主流汉语文学批评中独立出来，也在某种意义上展示出其跨学科、跨文化的面向^③，并以自身双语写作的实践出发，尤其注重内置于民族文学批评中的双语写作的异质性关系；而后者则对民族文学批评现状做出犀利的批判，认为尽管民族文学的批评和

① 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汤晓青：《1995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罗庆春：《转型中的构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8期。

研究一直在进行,“但长期以来都缺乏自觉地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去思考、反省、展开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还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①他同时列举了民族文学批评现状存在的诸种代表性问题。

此后,学者们关于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的努力仍在继续。2007 年到 2008 年间,徐新建和马绍玺不约而同地将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推进到全球化的视野和世界文学语境中。前者先指明了中国的多民族文化格局,又以其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切入对民族文学批评的建构^②,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彝藏走廊文化进行身分认同层面的考察;后者则直指中国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中的文化身分认同和文化流散问题^③。二位学者均认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批评范式已经和全球化的语境密不可分。2011 年、2012 年,欧阳可悝和李晓峰、刘大先分别出版了两部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建构直接关联的著作,由此,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进一步明晰和确立。其中,前者在著作中论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和实践”^④,并分别从历史哲学基础、本土地域文化、文学人类学、现代性等角度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又从宗教、社会、学科史等方面详细阐述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后者在著作中提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与民族文学批评密切相关的议题^⑤,从理论层面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一体共生样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更从实践上夯实了新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

2014 年,刘大先在其《文学的共和》一书中,重构和反思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对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又一次起到了极具意义的推动作用。本文分别从“多元文化共生语境”“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再造”“文本、田野、影像”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文学的共和》一书所主张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并逐一论述,进而讨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问题。

“多元文化共生”:民族文学批评的基础语境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本体呈现了多元文化话语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的文学批评,也不再是单声部的简介式评注,而是开始建构多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刘大先的《文学的共和》便是一个极具创新意义的尝试。

① 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年第 8 期。

② 徐新建:《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8 年。

③ 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④ 欧阳可悝、王敏:《“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⑤ 李晓峰、刘大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1949年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意识形态高度相关,各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被边缘化,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附属物。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关于这一点,诸多民族文学研究者都达成了一致:无论是藏族文学中的“雪域高原”,还是彝族文学中的“火塘”和“飞鹰”,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和“洪水”,都无一例外地将创作的精神内核指向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及其象征物。那么,经由“十七年”文学到八十年代民族传统回归的文学创作流变,给了文学批评者以多重视野进行考察和反思。在此语境下,《文学的共和》提供了关于建构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的思维范式。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始终影响着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批评研究。“多元”不仅仅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表征,亦是此书中的核心词汇之一。在“史”、“论”部分,刘大先分别用五分之二的篇幅来阐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如果逐一进行解读的话,《新启蒙时代的各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是其写作时间较早的一篇关于多元化民族文学批评的文论。同其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者一样,刘大先也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确立的重要语境,即“几乎所有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文学思潮,都与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①在此语境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便呈现了较大的创作热潮,并一直延续至今。当然,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并非是一个固化的文学现象,而是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因此,在这篇文论中,刘大先采取了历时性的分析模式,将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机制对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建构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自我觉醒与启蒙等文学现象分别论述,最后将现代性语境下的多民族文学互动关系的生产推进到“新启蒙时代”的进程中。

当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走向现代性的思辨问题。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持久的观察。例如,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对西方现代写作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吸收和模仿,对汉语掌握程度的娴熟和文化异质性的灵巧转换等,都是构成多元化、多民族文学的重要因素。刘大先在这一议题上,展开了“何种现代性”的讨论,他认为,此类创作的复杂性恰恰喻示了多民族文学交融、杂糅、良性互动关系的开端。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汉语写作进入了蓬勃生长的时期。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中国各民族文学创作通常呈现出差异、共生和流变,因此,许多研究者试图对少数民族文学流变做出观点各异的解读和分期:一些主流汉语文学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性和异质性置若罔闻,依然做出了和当代主流汉语文学史相同的、整齐划一的分期;另外一些民族文学研究者则注重多民族创作的差异和共生,参考大量的文本分析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①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同样,在《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中,刘大先从另一角度重新审视了多民族文学的流变问题。他注意并试图将关注的焦点推进到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所彰显的差异性上,因此他从五个方面绘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谱系——分为“怀旧与物哀”“地方性关怀与生态的诉求”“女性文学的蓬勃葳蕤”“母语、翻译与文体创新”“权势转移与边缘崛起”等等。从总体上来观察这五个方面的论述,作者是考察了少数民族文学内部较为边缘化的构成——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母语创作、生态写作等等。在当代主流汉语文学批评中,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这几类写作更是处于双重的边缘化位置。那么,作者从最容易被边缘和遮蔽的批评范式出发,对多元化、全球化的民族文学批评进行主体性建构,是十分有意义并且必要的举动。在此书“论”的部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全球语境:兼及多元性与共同价值》从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角度审视了多民族文学批评的价值和责任。这篇文章纵观了自“五四”文学到 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中华民族”“少数民族”等诸种概念,随后,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这个颇具现代性意味的词汇诞生之初,就已经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并且一直在此语境下生长。因此,多元化、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是有价值并且必要的。

在另外一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中,开篇作者便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主体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余年前被学者姚新勇所批判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又一次被作者犀利地批判为“批评话语系统的陈旧”。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视为主体性批评而非其他文学批评衍生物或者附庸,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议题。在主流汉语文学批评中,通常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只是冠之以民族性、审美性的标签,另外,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内部,又不乏知识考古学一类的考证分析。如何面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语境,是如何建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重要路径。因此,作者提出,无论是教材评注式还是文本鉴赏式的民族文学批评,都难以脱离陈旧的批评范式,建构一种基于多元文化共生的新型民族文学批评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

“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再造”:民族文学批评的面向

尽管有关民族文学的批评场域呈现了多声部的话语样态,然而,其中仍存在着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少数民族文学”术语本身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之下。早在 2000 年,吕微便撰文指出了这一问题,并将少数民族文学史定义在“国家学术”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①。另外,毛巧晖也曾研究过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②。诚

① 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② 毛巧晖:《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江汉论坛》2014 年第 9 期。

然,如果考察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不难发现,写作者笔下的族裔认同和文化记忆是和上世纪中叶民族识别的族属密切相关的。李晓峰曾分析上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小说中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并得出结论:“少数民族作家在通过表现各民族新生活表达对新中国和党的认同的同时,则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象征符号,建构了自己民族文化形象。”^①另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话语流变也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案例。在上世纪中叶,诗歌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样式一样,呈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一般特征。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各民族的诗人们,纷纷运用地域、民族的文化记忆、神话、象征物,杂糅以现代诗歌的语言进行写作,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异彩纷呈。然而,值得一提的并不是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笔下的传统和记忆问题,而是诗歌文本所体现的“文化传统”的再造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点恰恰很容易被少数民族诗歌批评者忽略或一笔带过。

如果追溯“文化传统”的再造的缘由,1984 年,莫福山和刘万庆在《文艺研究》上讨论了民族文学应该具有的特点,并得出结论:“必须学习和继承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用以创造出具有民族特点的新文学。”^②随后,在 1986 年《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可以找到更加确切的答案:“文学作品要具备民族特质,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任务。他们一直在多方面地努力。然而,这一切的关键,却是创作主体民族意识的强化。神圣的民族使命感,时刻在烘烤着鞭策着少数民族作家,去严肃地观察、揭示本民族的历史命运,以文学去辨析和扬弃自己民族性格的优质与劣质,从而自为地完成主体追求。”^③种种例证表明,同时期的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中,不仅民族文学书写中体现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记忆极其重要,写作者亦十分在意自己的族属,作家和诗人们越来越多地在作品中体现本民族的文化标签。他们更多强调的是上世纪中叶民族识别所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族属”,而不是划分之前的、未整合的“族属”。以彝族文学为例,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彝族汉语文学书写中,尚能观察到因四川、贵州、云南等不同地域的差异而造成的书写差异,而在新世纪之交,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奇迹般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彝”民族书写的合力,在一些作家和诗人的访谈录中,也通常可以看到强调自己族属身分的话语。他们如同哈钦森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动力学》中所言的知识分子那样,“知识分子这个术语不是指传道授业的范畴,而是指在其思想和行动中去考虑其意义的那些人。有两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一些人……表达运动中的文

① 李晓峰:《集体记忆·文化符号·民族形象——论 1950 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民族文学研究》2013 年第 6 期。

② 莫福山、刘万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和特点的讨论综述》,《文艺研究》1984 年第 6 期。

③ 《民族文学研究》评论员:《民族特质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民族文学研究》1986 年第 4 期。

化理想,另外一些人……将这些理想转化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①显然,前者正是构成新时期民族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这种消解地域差异而强调族属身分的文学话语流变,亦是“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刘大先也颇为关注这一议题。他分别在《文学的共和》的“史”和“论”的章节中,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两个议题,这两大议题从宏观和微观面向上构成了统一的呼应关系,进一步阐释了现代民族国家与多民族文学批评的关系。其中,在《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中,他将世界史作为中国现代民族转型的参照物,随后又将现代民族转型当作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参照物进行考察。这样的表述包含着知识考古学的意味,也为民族文学批评的建构赋予了历史感和纵深感^②。此后,他又在“论”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记忆问题》中,从文本内部出发,在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民族文学创作者的考察中,试图挖掘少数民族写作者呼吁文化记忆的深层原因。

和以往相关研究不同的是,刘大先以其掌握材料的丰富性、学理知识的完备性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及追本溯源式的文化研究。这样前后呼应的两篇文章恰恰是一种正本清源式的新型民族文学批评的构建路径,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的确立。如果仅仅强调张承志和乌热尔图等作家的个体写作经验,那么这类批评仍然是依附当代文学批评而存在,而刘大先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性到现代性的对应式考察,恰恰为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另一种创新思路。

文本、田野和影像:民族文学批评的边界

作为一部民族文学批评著作,文本细读的部分必不可少。通常,少数民族小说批评所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族裔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而刘大先恰好突破了这一批评范式,藉由文本分析对象突围,试图建构新型的民族文学批评。

《文学的共和》中对文本细读部分的遴选和考察极具匠心。“文本”部分由五篇论文构成,除了一篇题为《当我们谈论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在谈什么》的综述,其余四篇分别选择一个作家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可以看出,他选择的四位作家分别是潘年英、吴岩、叶梅、朱春雨,这些作家的族属包括侗族、满族、土家族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位作家的职业各具特色:人类学研究者、科幻小说写作者,《民族文学》主编、军旅作家。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身分标签并不单纯

^① 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87, p28.

^② 这篇文论还不是刘大先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关系论述的全部,更详细的表述可参考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是少数民族作家,还拥有其他的社会身分^①。因此,如何阅读和批评具有多重身分的作家作品,如何界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是否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亦是民族文学批评的焦点问题之一。

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还是本文开篇提及的关、朝二位学者的论著《多重选择的世界》,都着重论述了如何看待作家的族属以及写作中是否具有族裔特色等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族别归属进行定位并提出六条指导性意见^②,而《多重选择的世界》对民族作家分为若干种类型,如“文化自律”“认祖归宗”“文化他附”等等^③,尤其是最后一种类型,确立了并无明显族裔特色的作家作品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合法性。实质上,刘大先的《文学的共和》恰恰承继了这一批评话语,并不单单将他们置于主流汉语文学的批评视域,而是实践性地将“文化他附”型的作家作品分析视为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的一部分。

仔细观察书中所选择的四位作家,不难发现他们之于民族文学,有着不同的新型的理论生长点。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探讨过“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④,而潘年英恰恰正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同时又从事文学创作,具有双重社会身分的他,比其他专注于民俗和风土人情描写的创作者更能自觉地注入人类学的话语实践,因此刘大先将其定义为“文学人类学写作”;兼具科幻文学研究者和创作者身分的满族作家吴岩则被他称之为“利用本民族传统民间文学中的资源作现代性的转换”^⑤,拓展了民族文学批评的疆界;女性写作之于文学批评,原本就处在边缘化的位置,少数族裔女性写作亦是处于边缘的边缘,叶梅作为民族文学的编选者,又是女性少数民族作家,刘大先从女性写作的维度对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透视;另外,朱春雨作为一个满族身分被忽略、抑或是被遮蔽了的军旅小说家,同时具备了“外来者”和“族内人”的身分,这种颇具矛盾性的双重身分的碰撞引起了刘大先的注意,他认为朱春雨的创作恰逢寻根文学的浪潮,又同少数民族文学有机结合起来,这同样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的构建。

在传统的民族文学批评范式中,文本分析通常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田野和影像总是被边缘化、模糊化。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也常常会涉及口头传统或者叙事文本的电影改编,因此少数民族电影研究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构成要素之一,如学者李晓峰就曾

① 其中两位作家的职业甚至和少数民族文学毫无关系。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简报》(七),1984年。

③ 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 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⑤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第199页。

经以电影《刘三姐》为例,论述当代少数民族话语的“发生”^①。然而,对于少数民族批评主体性的建构而言,电影批评始终游离于其外。可以说,《文学的共和》一书,对少数民族电影批评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重塑。首先,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切入对少数民族电影书写的考察,在这项考察中,他列举了大量的与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电影案例,并将其分为四种叙事模式:外来者、代际冲突、仪式、民俗象征等等;其次,他从文化遗产和经济学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之关系出发,论述了经济时代的“符号化”对电影的影响、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新文化”电影的诞生等议题;随后,他选取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书写之中的典型案例——以西藏为题材的影像作品或者影视书写,进行深度的调查和研究。

在刘大先看来,对文本和电影的考察显然不是民族文学批评的全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离不开“文学”的“现场”,人类学研究也通常会和民族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他分别通过对新疆、广西田阳、云南宁洱、海南五指山、甘肃临夏、湖北长阳等地区的田野考察、数据分析、理论思考,将田野工作的部分融入对民族文学的思考,这样的努力显然有助于丰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

结语:关于“共和”

在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之后,似乎还需要关照论者的核心话语概念:“文学的共和”。刘大先在后记里阐明自己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通过敞亮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致‘和’的风貌,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理念的再诠释,所谓千灯互照、美美与共;同时也是对‘人民共和’到‘文学共和’的一个扩展与推衍。”^②2007年,关纪新等人共同倡导“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主张民族文学研究者应该以现代的民族观为背景,注重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③。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的共和”恰好构成多民族文学史观主张的回应,亦是承继了几代民族文学研究者多元文化共生理念的新型批评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度青年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流变研究”(项目编号:15CZW058)阶段性成果。

(邱婧,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周翔】

① 李晓峰:《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第332页。

③ 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